

第一章

绪言：源自环境体认的坐向、朝向和指向

当一座建筑的正门——同时也往往是主要的开窗面——正对着南方，人们会用“坐北朝南”来描述这座建筑的坐落。这是把建筑比作一个端坐的人，门与主要开窗面相当于人的正面，与之相反的面则相当于人的背面。着眼于人的环境体认的常规，背对意味着“依托”“基于”，乃至“来自”，而面对意味着“趋向”“接纳”，乃至“归于”。建筑必然有向有背，相关的感受不可避免，所以，合理地进行向与背安排是建筑设置的基本问题之一。不仅如此，建筑除了正面和背面，还有侧面，虽然没有正面和背面重要，但其与周边环境的关系也是人们了解建筑价值和地位的依据。

在东亚大陆的北回归线以北，太阳早上由东方升起，正午行至人的头顶偏南，傍晚由西边沉落。太阳在一天中最能够提供热量的时段，是其处在人们南边的時候。为了享受日照带来的好处，这里的建筑南面相对开放很是自然；此外，东亚大陆腹地冬季以北风为主，建筑的进出口南开，不仅可以避免冬天出门时呛风，而且有更多的机会感受风和日丽的景象。因此，在没有具体的工程和环境限制时，东亚大陆腹地的大多数地区，建筑物或者建筑群组中的主导建筑“坐北朝南”的布置方式，是最符合人类居住的物理 - 心理要求的安排^[1]。也就是说，以具体的地理、气候条件为依据，在东亚大陆腹地活动的人群将自己居住的房屋面对南方以外的其他方向或者过于偏离坐北朝南的安排，就实际上放弃了对于长期在这里活动的人群十分明确的且在原始条件下十分必要的、唾手可得的好处。人们不会平白无故地放弃大自然慷慨的赠予，所以，在上古人类更为直接地面对大自然的情况下，建筑朝向其他的方向或过于偏离坐北朝南的布置，应该意味着人们在追求常规的物理 - 心理需求以外的东西。

相对系统地观察现有考古材料，可以看到，在先秦时期的东亚大陆腹地，存在着诸多建筑物或者建筑群组中的主导建筑朝向严重偏离坐北朝南安排的实例。这种状况鼓励以探求其之所以如此为目的的测量工作的开展。毋庸讳言，测量的结果确实让人惊异。因为除了那些严重偏离了坐北朝南布置的建筑，就连那些大体上正南北向安排的建筑，其主导的轴线都明确地与高等级的“神明之隩”“设围基址”或者其他具有特殊意义的考古遗址相关联。

远古时，道路未辟，人类交通及生存空间的拓展主要是依托自然河道展开。在蒙昧的时代，在这样的情况下，河道上的那些有利于作为空间控制依凭的地点，会很自然地被人们视为神灵栖息或出没之地——神明之隩。一般地说，神明之隩是那些河道上空间格局和河水流势出现大幅变动的地点，这些地点包括了河流的发源地、河流的入山口和出山口、河流及大海与大山相夹处、河流的交汇点、河流的剧烈转折处，以及河流汇入大湖或大海的地段。在众多的神明之隩中，那些长程河流上的神明之隩往往在区域空间控制上具有突出价值，故此可以谓之高等级神明之隩。这样的神明之隩，不仅是强势族群力图控制的要点，也是十分重要的地理-空间标识^[2]。

“设围基址”，是指遗址上含有圈围一定地段的壕沟或者厚重墙垣的遗址。观察显示，在西周以前的考古遗址中，“设围基址”不仅稀少，而且只在那些在地理空间控制上具有突出价值的高等级神明之隩附近出现。这种状况，指示着它与一定地区的强势人群或者主导人群间的必然关联。

从考古遗存的状况和工程发生的角度看，厚重的墙垣或者城垣是壕沟的衍生物。基于最初的用以圈围一定地段的壕沟往往窄、浅，不具备确切的物质性功能，故可知起初壕沟只是某种空间性质的标识。一方面，较早的设围基址只在高等级的神明之隩附近出现，这在相当程度上暗示它与祭祀相关。另一方面，许多壕沟的平面形状指明了由西南而东北动线的存在，由于在古人那里，主导功能为祖宗祭祀的明堂要“由西南入”，故而，可以认为在多数情况下，设围基址首先与明堂建筑相关^[3]。

这里所谓的“具有特殊意义的考古遗址”，是指那些有着特殊出土物且堆积丰厚的旧石器时代遗址。考察表明，在新石器时代初期设围基址出现之前，在诸

多高等级的神明之隩附近，往往会出现被人类长期或反复利用从而造成了丰厚堆积物的地点，具体的发掘往往显示，这些地点不只是堆积丰厚，还会有反映当时文化进展的文物出现。

对于人类来说，表明自己的来历既是植根深远的内在需求，又是进行社会认同的重要依据。出于对建筑要素本身在空间体认上价值的考虑，利用建筑与特定地点的关系，表达其主张者的“依托”“来自”“归于”或者“空间渊源”应该十分自然。在大地缺乏系统区划和编码的远古，通过自己的营造物与特殊的视觉—心理标识点建立联系，当是十分自然地显示自身来历的重要侧面——“空间渊源”的手段。高等级的神明之隩、设围基址及具有丰厚遗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在人类社会生活组织和发展上具有突出的价值，所以它们可以成为人们交待自身空间渊源的标的物中的甄选。

建筑的朝向或坐向可以成为其主张者空间渊源表达的手段，在这个基础上拓展，利用居址上的其他营造要素进行相关表达也就顺理成章。由于用以圈围建设地段的壕沟或厚重墙垣本就是场所意义及价值的特殊标识，故而使用圈围的段落进行相应场所主张者的空间渊源标识也就顺理成章了。事实上，对有条件进行相应测量的遗址上的圈围段落进行的测量显示，西汉以前的设围基址上的圈围段落，确实系统性地与东亚大陆腹地的神明之隩或其他类型的地理标识物之间有着明确的指向关联。

圈围的建设受到营造经济与工程便利要求的制约。在没有地形、地质条件限制时，采用简单的圆形乃至规则矩形或其变体是最为简明的解决空间性质标定问题的办法。现知的先秦时期的设围基址大多处于相对平坦的地段，不存在非得如是限制，所以，现有考古材料显示的相应时期广泛存在的过于偏离简单的圆形或规则矩形的，由看似毫无“根据”、曲折多变的段落构成的圈围形态，就在相当程度上显示了人们在发掘圈围传达“额外”的意义上所做的努力。

从逻辑上看，一旦圈围被理解为由众多段落构成的体系，圈围在建设地段意义营造上的作用就有机会大加拓展。

通常谈论的建筑的朝向或者坐向，是以建筑平面采用规则矩形或者建筑物由多个体量构成时，其各部分之间垂直或平行接续为基础的。其实，为了满足建筑

主张者更多地进行指向安排的要求，建筑物也可以放弃规则矩形，或者各体量间平行或垂直接续的做法。对于前者，建筑就不仅有坐向与朝向的问题（也有可能这种问题不复存在），墙体或者柱列也成了独立的方向表达要素；对于后者，每个建筑体量朝向或坐向则都成了需要单独进行“方向关注”的对象。

必须强调，建设地段上的主导建筑及圈围段落显示的，应是那些与建设地段相关的人群中有权力进行表达的人群的空间渊源。或者说，并不是所有的与相应遗址相关的人群的空间渊源都会在相应遗址的设置上得到体现。可以设想，相应权力的获得，既可以来自相应人群的实力，也可以来自与其他人群的关系，当然，还可以来自其在空间上的代表性。这里所说的空间代表性，是指其是否在该基址的主张者设定的空间权力范围上占有一席之地。

以通常的社会组织为据，在可以表达其空间渊源的人群中，还会有一个次序存在。基于环境要素设置过程与组织格局，可以认为，主导建筑是权重位高的人群显示自己空间渊源的首选；相较于主导建筑，地位较次要的人群的空间渊源可以通过圈围段落的指向呈现。考虑到人的活动状态，与人的活动关联度较高的位于主导建筑前方的圈围段落应该相对重要。当设围基址上存在着多重圈围时，由内而外，圈围的重要性依次降低。可以推想，一定人群的空间渊源得以显示的圈围段落越重要，其地位就越高；反之，地位就越低。这样，在当时，圈围的形式安排，还关涉相关人群之间关系的梳理。

在对具体遗址的实际测量中经常看到，某一地点作为圈围段落的指向标的反复出现的情况，这应该是该遗址的主张者中，以同一地点为空间渊源却在另外方面有着差异的人群的存在的表达。

需要特别指出，在蒙昧时代，显示与遗址相关的族群的空间渊源，与祈求与相应空间对应的祖灵的保佑，其实只有一线之隔。在许多时候，这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

不同的遗址涉及的神明之隲或设围基址数量的多寡，既可以是遗址辐射能力强弱的表示，也可以是权力集中水平差异的显现。具体地说，遗址关涉的地点多，既可以是辐射能力强的表示，也可以是权力集中水平较低的反映；遗址关涉的地点少，既可以是辐射能力弱的表示，也可以是权力集中水平较高的说明。具体的

判断，要结合对遗址存在的理由及整体背景条件的分析来进行。

对空间渊源的关切，在相当程度上是祖灵崇拜的自然延伸。与单纯的祖灵崇拜不同，在对空间渊源的关切中隐含了对相应空间的权力主张。即在许多时候，考古遗址上的人类营造物显示的对于空间渊源的标定，是相应人群主张领有该空间的表示，尤其是当该空间为敌对者控制时更是如此。在没有文献支持的情况下，对于敌对方的判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考古学文化的异同；二是大型遗址分布格局以及主导遗址间是否有防卫意向存在；三是相对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在一定时期的空间的消长格局。

从历史来看，与空间控制相关的高等级神明之隳与设围基址系统，是随着空间控制手段和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大体地说，空间控制手段和条件包括了人口分布模式、地理形势、交通工具与道路网络、战争模式，以及空间计较水平，等等。

由本书涉及的营造设置的指向标的看，有许多地点在相当长的时间反复地作为标的出现，这表明人们对于该地点的认同具有很强的延续性。与之对应，在历史上，原本作为指向标的的地点不再作为标的和新的地点作为营造设置的指向标的而出现的情况确实不断出现，这应该与社会条件变化导致的重要人群的退隐和生产有关。一定地点作为指向标的存在的持续性和被反复指示的水平，当然是该地点或相关人群历史地位的说明。而一定营造系统提供的新的指向标的的多少，以及这些指向标的的持续存在或被反复指认的水平则是相应遗址的历史地位或其秩序塑造能力的表征。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在本书涉及的时间段里，人们的测量技术并没有达到今天的水平，建筑施工的精细水平也有限，加上不同的圈围段落衔接时因技术限制造成的指向干扰等，使得本书在面对具体圈围时，不得不进行一定水平的段落归纳。为了保证结论的客观性，本书的操作过程特别强调圈围段落归纳工作的独立性。尽管如此，由于基础资料在某种程度上的含糊或微妙，圈围段落归纳的主观性不可避免。由实际的结果看，值得欣慰的是，虽然我们无法保证每个归纳和标的的辨识都正确无误，但是诸多特殊地点被反复地作为标的指认、遗址设置指向标的的空间结构与历史记述提供的空间可能的呼应、遗址设置指向标的与遗址空间

控制态势及遗址性质的结构性契合，以及标的地点涌现次序与社会发展进程的关联等，至少应该明白无误地证明了中国古代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利用建筑乃至圈围段落指向表明相应人群的空间渊源的做法存在的系统性。

另外，在地图上对建筑的朝向及圈围段落的指向进行标识时，在一些时候可以看到相应的线段与不止一个导致意义发生的地点关联的情况出现，这种情况的发生既可能是设置者为强化意义形成的刻意做法，也可能是事出偶然。最终的确定，在缺乏相互质证的资料时，也就难免武断。为了克服偶然性带来的干扰，在建筑轴线及圈围段落指向标的确定上，本书强调关联密切水平的基础性，即在可能的标的中，选择相值水平最高的那一个；如果相值水平相当，则优先考虑两者间距离更小的那一个。当然，也可能在考虑遗址的特性的基础上相关者都选。为了判断的可靠，在实际操作中寻求额外的信息支持是必需的。这些信息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考古学文化的关联性；二是遗址间时空沟通的可能性；三是重要遗存的相关性；四是遗址所在群体的组织性与约束性；五是对于研究对象的地位及其建设目的性的认知。无论如何，合理结论的得出，离不开对相应时期东亚大陆腹地的政治—军事格局和空间结构的恰当的理解。

应该说明，本书采取的设围基址圈围段落归纳的基准为其延展长度不小于10米，并在必要时根据考古材料所提供的图纸考虑设围基址主张者在工程操作时可能的空间感受做出调整。

遗憾的是，目前很少有遗址能够提供建筑物的朝向材料，即使有一定的建筑物朝向材料，在许多时候，也因为相关材料不够系统而无法判断其是否是圈围匹配的主导建筑。虽然在许多时候，圈围段落的指向会与建筑的朝向重复，但上述情况毕竟使完整的与遗址相关的人群秩序辨识不能开展。此外，粗看之下，圈围的材料丰富，但实际上材料完整的例子十分有限。材料不全，这当然会使相关的讨论缺乏应有的系统性。

因为现有的圈围材料较建筑材料要丰富很多。而设围基址是强势或主导族群的标识，所以，原始材料的状况决定了相应的讨论只能在东亚大陆腹地主导人群的层面上进行。

由传世的文献看，古人是以北极，即真北方向作为定向的基准的。特别是

本书的讨论表明了建立营造物与北极的关联，指示着环境设置意义建构的全新阶段。所以，为了叙述的顺利开展，本书的讨论以真北方向，即定位根据——北极为基础。或者说，本书的讨论以相应的建筑轴线或圈围段落指向线与所有经线相交保持同一角度为基础，其在采用墨卡托投影的地图上表现为直线。

目前所见考古遗迹图中标识的北方向包括真北方向、磁北方向和坐标北方向^[4-7]。磁北方向与真北方向之间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偏差——磁偏角，坐标北方向与真北方向之间有一个子午线收敛角。在使用考古材料时，对于使用磁北方向的考古遗迹图，本书通过查询该遗址发掘年的当地磁偏角数值^[8]，将磁北方向转换为真北方向。由于具体的技术原因，这样通常得到的是一个与真北方向存在差值的“伪真北方向”。在一般情况下，这一差值不会很大，因而对建筑轴线或圈围段落指向的确认不会造成重大影响。由于子午线收敛角的数据较难获取，且在我国1:10 000及更大比例尺的测绘图中，子午线收敛角的最大值仅为1.5度，着眼于整体结论的结构性合理，这样的差值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故而本书不对采用坐标北方向的考古遗迹图进行方向转换^[9]。

为了保证结论相对可靠，本书在考古材料的使用上，在通常情况下，示意图不用，图上无指北针者不用，图纸不清晰者不用，无对应文字说明者不用，文字说明与图纸不相符者不用。

在本书的叙述中，经常会出现圈围段落和建筑轴线以后出之设围基址、后来的城镇、后来才有的河流汇入大海及湖泊处、后出之河流交汇点以及后出之河道要点为指向标的的情况。这些情况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在本书看来，这些标的点上，或者在当时，或者在之前已经有特殊的人类活动发生，或者该处的物理状态虽然与今不同，但因为其具有足够特殊的区位、环境、地形、地质条件，在当时就已经被辨识为高等级的神明之隩，并引发人们的空间认同。

应该说，这里展开的是一个建立在原始资料精确水平和系统性均有限的基础上的探讨。具体条件使得本书的叙述不得不面对诸多细节冒险，但在类似的讨论开展的机会十分稀少和结构性合理的结论值得追求这样的判断面前，冒险甚至是失误可以被理解为“必要的代价”，所以我们可以展开下面的旅程。

注释

- [1] 王鲁民:《营国:东汉以前华夏聚落景观规制与秩序》,同济大学出版社,2017,第16页。
- [2] 王鲁民:《塑造中国:东亚大陆腹地早期聚落组织与空间架构》,大象出版社,2023,第19-22页。
- [3] 蔡邕《明堂月令论》:“明堂者,天子太庙……”《礼记·明堂位》:“太庙,天子曰明堂。”可知祭祖是明堂的核心功能,后人提及的明堂的其他功能,都是从属功能,至于后世谓明堂祭天,其实在古人那里,天就是远祖,详见后文。
- [4] 严文明:《考古遗址的发掘方法》,载北京大学考古系编《考古学研究(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第249-266页。
- [5] 尚杰、姚金隆:《考古测量的误区——磁偏角》,《江汉考古》2010年第2期。
- [6] 刘建国:《考古测绘100年》,《江汉考古》2021年第6期。
- [7] 曹艳朋:《田野考古中“北”方向问题探究》,《华夏考古》2021年第2期。
- [8] 磁偏角信息的获取地址为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网(<https://www.ngdc.noaa.gov/geomag/calculators/magcalc.shtml#declination>)。
- [9] 为了叙述简明扼要,本书原则上不提供具体遗址的设置指向标的位置图。考虑到对原始材料的尊重以及图纸表达的清晰和美观,本书提供的遗迹指向归纳图均在原始材料的基础上进行。

